

《紫陽花》

第一部 離鄉

“The Shamash is the candle that lights the others. Be a Shamash.”

— Rabbi David Wolpe¹

在那天之後，他明白一切都會不一樣了。

所謂的那天，是世紀瘟疫發生的第一年，那年三月的第一個禮拜天。他一早就從鄰近柏林特雷普托爾公園²的單人公寓，開車前往白湖猶太墓園³。

這裡雖也是柏林，但距離他的住家車程要三十分鐘，到了白湖之後，連續拐了幾個小彎才找到這處僻靜的墓園。

沿著赭色的外牆走著，心情慢慢平撫下來，數十公尺的高牆上凸雕出數個一公尺高的猶太教七燈燭台，他覺得那巨大的分支奮力向天空延伸，就像一棵生命之樹，這樣一想突然心裡多了些力量。

那天的天氣不算好也不太壞，標準的三月天，天空一片陰白，雨還落不下來。從大門進去後，他憑著有點斑駁的記憶，尋找著赫希（Hirsch）家族的墓碑。他記得很小的時候，跟著爺爺來過一次，當時的他只覺得這座墓園怎麼走都走不完，四周肅穆的氣氛讓他有些害怕，全程他都緊握著爺爺溫暖的大手，說什麼都不肯鬆開。

那座記憶中的墓碑是深墨色，雖不比其他宏偉氣派的墓碑，但在設計上卻有獨特之處。佔地不到兩尺寬的墓台，就像敞開的小庭院，庭身向內延伸，壁上以金漆刻寫著墓碑主人的名字，是合葬在一起的赫希夫婦。兩段簡短的生平左右對稱，底下則有一幅精緻的北斗七星，象徵為家族後代子孫帶來好運。

¹ 猶太教 12 月慶祝的「光明節」是一年最盛大的節日。猶太人家中會點亮光明節使用的「九燈燭台」，由名為「夏馬許（Shamash）」的第九盞燭台來點燃其他八支燭台。每天只點亮一支，連續八天後，獲得滿屋光明。希伯來文的「Shamash」，指的是助人者（helper）、為他人奉獻的人。因而這句引文的意思是「夏馬許是用來點燃其他蠟燭的燭台。期許自己作為夏馬許——拉比 大衛·渥普」

² Treptower Park，位於柏林東南方，是柏林第二大的公園。

³ Weißensee Cemetery，位於柏林「白湖（Weißensee）」，建於 1880 年，是歐洲第二大的猶太墓園，佔地 42 公頃，裡頭安息著超過 11 萬名猶太人。

這座墓碑的細節與設計上的巧思，以及這座墓園背後的歷史，都是他後來查資料才得知。但這時他腦中還被其他思緒佔據，只想著找到墓碑也許能帶來什麼線索。

在他努力對照著墓園分區標誌，左拐又右彎，幾乎以為自己要迷路的同時，赫然發現前方那座墓碑，似乎就是他正在尋找的記憶。但墓前還站著一個人，遠看是位身材瘦小的老婦人。

再定睛一看，那是長年待在家裡幾乎足不出戶的，翠姨？

柏林 2020

時間得推回兩個月前，他在整理爺爺遺物時，意外發現一封擔保信，內容是赫希夫婦願意承擔蔣寧在德國的一切食宿費用，希望上海政府放行，讓蔣寧到德國繼續因戰爭中斷的學業。這封信件最底下押著日期：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

蔣寧是西蒙（Simon）的爺爺，赫希夫婦是西蒙的外曾祖父母，早在西蒙出生前就過世了。裝著擔保信的盒子底部，還有一枚精緻的銀戒指與一張黑白相片，兩個十來歲模樣的孩子，在相機前笑得燦爛，男孩梳著西裝頭，穿著短袖襯衫和筆挺短褲；女孩面容清秀，一襲碎花洋裝巧妙遮掩略顯過瘦的身材。照片背面是褪色的兩排字跡：N&S，一九四一年夏。

N 應該是爺爺名字的縮寫，但 S 是誰？西蒙覺得這女孩的臉孔有些面熟，好像在哪裡見過。雖然是老照片了，但從中透露出的親暱，讓人一看就明白兩人的關係匪淺。

他倒是從沒聽爺爺提起過去在中國有青梅竹馬。再來，是怎麼樣的交情，讓他刻意將兩人合照和重要文件放在同一個黑木盒裡，收藏在抽屜最深處，彷彿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再仔細觀察，這個木盒子雖有年歲，但上頭不見一絲灰塵，肯定有人經常擦拭。

西蒙將這個木盒帶回家中，再拿出照片細細端詳。他不曾看過爺爺年輕時的身影，爺爺對外總聲稱自己來自台灣，唯有家人知道，爺爺的家族其實來自上海。但要再細究下去，西蒙就糊塗了。他不明白為何爺爺總堅持自己的國籍是台灣，有次甚至跟戶政人員在外事局吵了起來，只因對方在住址登記表上，將爺爺的國籍填上代表中國的 PRC，當時德國戶政系統裡的國籍欄還沒有台灣。但爺爺才不管這些，他將所有文件一把搶回來，氣急敗壞告訴對方：「我這輩子都不會是中國人，那個鬼地方才不是我的家。」

小時候他曾坐在爺爺的腿上，央求他多說點關於那個遙遠國家的故事，他想知道，自己濃密的黑髮從何而來？自己血液裡屬於東方的部分，一直都是個謎。但爺爺只是摸著他的頭，跟他說等他長大了，就會明白了。如今隨著爺爺仙逝，他得自己找出答案。

西蒙的爸媽在他十五歲時離婚，他跟著媽媽，也就是蔣寧唯一的女兒蔣思亞。即便如此，西蒙仍留著父姓，全名是桑塔格·西蒙（Simon Sonntag）。

西蒙的媽媽在離婚後，選擇從原本漢諾威的住家，搬到柏林，就近照顧年邁的父母親。她在東南方近郊柯本尼克（Köpenick）租了兩房公寓，每天開車到位於柏林西南方夏洛騰堡區（Charlottenburg）的醫院上班。護理師的生活作息不固定，三班制的工作型態，讓她少有機會能好好坐下來和西蒙一起吃頓晚餐。因此西蒙在高中時期，放學後常直接到離家不遠的外祖父母家，爺爺燒得一手好菜，他到現在仍常常懷念。

也是從那段時間起，他才有比較多時間和爺爺聊天，中文程度也漸漸隨著使用的頻率變高，從大略聽得懂、但說不出來，到能以簡單句子與爺爺對話。

西蒙算起來只有四分之一華裔血統，奶奶蘿特（Lotte）是德國猶太人，十一歲那年隨著爸媽，也就是赫希夫婦，從德國逃難到上海，據說是在那時認識蔣寧一家，但雙方情愫要到數十年之後，才在戰火的餘燼中燃起。

上海 1927

「有大消息了！秀秀啊，有大消息了！」蔣照生一回家，手提包都來不及放下，就急著奔往廚房，找尋妻子的身影。

天還沒黑，孩子還在房裡酣睡著，挺著七個月孕肚的王秀秀，正在廚房裡準備一家三口的晚餐，聽到丈夫大聲嚷嚷，停下手上的切菜動作，抬起頭問他：

「怎麼啦？大呼小叫的。」

「不得了啦，聽說蔣主席大婚，找我們照相館來拍照啊。」蔣照生一口氣把口中的「大消息」說完，看著妻子兩眼瞪得大大的，「這是真的，我們老闆都同我說了，要請大哥去拍呢。」

秀秀聞言，呆了半晌，隨而眼角泛起淚水，「太好了，我們的好日子不遠了。」

蔣照生和王秀秀結婚剛滿三年，大女兒兩歲，還牙牙學語，家裡只靠照生在照相館的單薄收入，雖然不是什麼多賺錢的行業，但自從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輸得一塌糊塗，一八四二年與英國政府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包含上海在內的五座城市通商貿易，自此帶起上海的風華時代。

隔年上海開埠，搖身一變成為極重要的埠口，許多洋人與國外傳教士，帶著當時已有的照相設備渡海而來，直到一九二〇年代，多家照相館先後崛起，拍照逐漸蔚為風氣。

照生與秀秀的大哥王貴遜在「中華照相館」一同從學徒幹起，五年的時光一轉眼就過了，兩人不僅身懷好手藝，對拍照與研究相機技術更是充滿幹勁。他們都暗自覺得，「中華照相館」的老闆是宋子文的同窗，跟著他身邊飛黃騰達的日子指日可待。想到這裡，兩人工作起來更加賣力，期盼將來時機成熟了，自己也能開家照相館當老闆。

這樣的時機終於被他們等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蔣介石與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齡舉行婚禮，負責掌鏡的王貴遜快門一喀擦，留下影中彷彿天造地設的一對。蔣介石一身筆挺西裝，雙眼炯炯有神，宋美齡披著長頭紗、捧在懷前的大把鮮花將白色婚紗襯得更加脫俗，長長的裙擺拖曳在腳邊，更顯夢幻。這場世紀婚禮的婚紗照一曝光，頓時掀起上海一股拍攝西方婚紗照的風潮，「中華照相館」也一砲打響名號。

當時上海最出名的是黃浦區南京路上的「王開照相館」，老闆王熾開深諳經營之道，該年八月上海主辦第八屆遠東運動會，除了地主國中華民國，還包括日本、菲律賓參賽，上海各家報紙無不大篇幅天天報導難得的國際賽事。王熾開取得拍攝權後，親自出馬搶拍重要賽事，當晚趕著沖洗、再以低廉價格提供給沒有派任專職攝影記者的報社，唯一的條件是要在照片底下加註「上海王開照相館攝」字樣。隨著賽事熱潮翻騰，看報得知比賽始末的民眾，也對「王開照相館」印象深刻，知名度隨之水漲船高。

「中華照相館」的知名度雖略遜一籌，但在蔣宋大婚後，稍稍扳回顏面，許多政商名流紛紛上門指定拍攝肖像照或是婚紗照，王貴遜的名號響亮，他和蔣照生都覺得，自立門戶的時機似乎成熟了。

恰好店裡一位常客有片店面要出售，就位在與黃浦相鄰的虹口區，讓王蔣兩人暗暗叫好。這裡在清末上海開埠後快速發展，南端臨江地區由於位於黃浦江轉彎處，擁有吃水深的天然地理優勢，設有二十多座碼頭，成為上海最重要的水路港口。

不僅如此，虹口區南側自一八四八年被劃為美租界，後與英租界合稱為共同租界，或公共租界；一八七零年代起又有許多日本人來到上海經商，多數聚居於虹口一帶。當地數十年來大量移民湧入，華洋雜居，商鋪雲集，報社、學校、教堂、醫院等紛紛成立，這裡正象徵著上海繁榮發展的一面。

王貴遜和蔣照生正是看中這一點，一來當時照相仍是有錢人的娛樂，在相館拍張肖像照得花去兩塊大洋，一般老百姓哪裡捨得拍？但洋人出手闊綽，先前他倆在「中華照相館」當學徒時，便不時有在上海經商定居的外僑，攜家帶著來相館拍全家福，兩人也因此學會簡單英語交談，做生意勉強應付還堪用。

二來虹口戲院雲集，早在一九〇八年西班牙人雷瑪斯在海寧路、乍浦路口，租了一座溜冰場，簡單以鐵皮圍了一圈，裡頭擺放兩百五十張木頭椅子，就這樣開了中國第一座正式的电影院，取名為「虹口活動影戲園」。

由於大受好評，自此如雨後春筍般，外國人紛紛出資在虹口開設戲院，光是二〇年代末這裡就有二十多家戲院。出名的像是海寧路上的維多利亞大戲院，能容納多達八百個座位，票價高得嚇人，包廂頭等席一元五角、特等席一元三角。當時黃包車拉伏一個月薪水約四元，一般平民只能看著戲院外的劇照咋舌，這兒出入的無非是有錢華人與外國僑民。

王蔣兩人算盤打得精，虹口相距南京路市中心僅隔著一條蘇州河，房租卻少了一大截，尤其是北四川路附近戲院眾星雲集，華商曾煥堂斥資改建的上海大戲院、剛成立兩年的奧迪安大戲院都在這條路上，只隔一條巷子的虹口大戲院更是市井小民憑幾個銅板就能進場看戲的好去處，將照相館開在這裡準能吸引人潮。

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的十月，「耀華照相館」風風光光在北四川路開張了，蔣照生在《申報》刊載了一張啟事：「技術一流，名耀中華。名媛淑女，亮麗佳人，肖像照、婚紗照最專業選擇，開幕期間一律九折。」

同年十二月，蔣家喜上加喜，照生的長子、排行老三的蔣寧出生，額頭飽滿、四肢修長，來道賀的賓客都稱讚像極了父親。仍臥床休養的王秀秀只暗自擔心這孩子將來不知要面臨何種世道，盼望戰火別波及到照相館生意與家中三個孩子的安危。

秀秀的擔憂其來有自，去年初不時在街上看見大批工人舉著長槍遊行，當時街上流傳著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漸明，共產黨很可能會趁機作祟，在蘇俄的拉拔下「幹一票大的」。她雖不甚明白這兵家之爭，但這一兩年來政局變化甚大。就連市井小民也嗅出可能要變天了。

由蔣介石率領的國民政府北伐軍勢如破竹，一路挺進上海。蠢蠢欲動想從北洋軍閥手中奪回主權的上海工人們，則在中共領導訓練下，憑著槍枝、甚至一把斧頭，成立工人糾察隊，接連發動三次武裝起義。三月二十二日，電氣、郵務、鐵路等各業工人，加上上海、復旦、暨南大學的學生們，緊急發起全市總罷工，向各區警署、兵工廠、電話局、火車站與駐紮在上海的軍閥部隊直魯聯軍發動全面進攻，最後成功拿下上海，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

表面上北洋軍在上海的勢力是被驅逐了，但國共兩黨的主權爭奪才正拉開序幕，蔣介石在四月十二日解散上海臨時政府，將上海工人糾察隊繳械，結束短數的工人政權。在北伐戰爭期間，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內訌愈趨白熱化，蔣決定發動清黨行動，清除混在黨內的共產黨人，各地國民黨黨部進行整肅，手段不一。

蔣照生雖非政治狂熱份子，但也親眼目睹、聽聞不少遭誣陷是共產黨的仕紳，最後丟掉性命。他將國民黨（或更確切說是蔣介石）殘暴驅逐異己的行徑看在眼裡，更堅定這輩子不碰政治的決心。這些年不乏有人暗示要他選邊站，他都以對政治不感興趣為由推辭，只專心眼前剛開張的照相館。

時光荏苒，一九三二年九月，蔣寧的么妹蔣翠出世，才四歲大的蔣寧還記得第一眼看到妹妹紅撲撲的小臉，小小的身軀被媽媽用被巾緊緊裹著，怕剛出生幾天的嬰孩受到風寒。趁著媽媽剛餵完奶離開房間，蔣寧悄悄地走到小床邊，妹妹睜著圓滾滾的大眼睛，衝著他一笑，他覺得有什麼熱熱的東西從心裡漾開來，兩人之間似乎產生一種奇妙的連結。

彼時耀華照相館生意正如日中天，隨著上海電影業蓬勃發展，捧紅許多女星，蔣照生透過過去在中華照相館的熟人，和一些電影公司搭上線，負責拍攝電影劇照。對方一聽攝影師是王貴遜，便明白出品的照片有一定水準，再加上蔣照生做生意講求信用，不因利潤多寡亂哄抬價錢。幾次合作下來，電影大賣，掛在照相館櫥窗的劇照更吸引影迷前來朝聖，甚至有人特地上門要求拍攝肖像照，刻意擺出和電影女主角同樣的姿勢，引起一股追星潮流。

蔣寧的大姐蔣音跟二姐蔣雁，一個七歲、一個六歲，正是要開始識字的年紀，兩人也常坐在店裡，跟著媽媽習字。她們還讀不懂報紙上的長篇新聞，倒是指認得出爸爸刊登在報紙上的廣告，蔣音會興奮地指著上頭的「耀華」兩字，要媽媽將廣告內容唸給她聽。她覺得家裡開照相館神氣極了，店裡不時會有女明星來打招呼，這麼近距離看電影裡出現的人，這可是其他孩子不會有的經驗。

在這一年發生了一件插曲，差點波及到照相館的生存。那是四月底的時候，上海剛經歷日本軍發起的淞滬戰爭不久，國民政府十九路軍不敵不斷擴大作戰規模的日軍，被迫全數撤退，儘管國民黨緊急推舉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暨參謀總長，但其陸續調派的軍隊卻未能及時支援前線，自此大勢已定，日軍片面宣布停戰。

四月二十九日，打了勝仗的日本人歡欣鼓舞選在虹口公園慶祝，並舉行閱兵。日本政要與將領皆出席這項祝捷大會，因此現場戒備森嚴，只准日本人與少數受邀的外國使節到場。

就在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正發表演講時，一名假扮成日本人的韓國青年混入人群，等到日本國歌《君之代》歌聲響起，他毫不猶豫將手中的水壺砸向主席台，瞬間轟地一聲，炸彈碎片四射，尖叫聲此起彼落，正站在主席台上的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與數名軍官當場被炸死，駐華公使重光葵遭炸傷右腿，終身殘廢。

那天蔣照生與一群攝影同好約在附近聚會，正要前往咖啡館的路上，忽然聽到一聲巨響，地面隨之劇烈搖晃。當時他們都不知道發生何事，只見一群人從公園裡匆忙逃出，日軍隨即大規模逮捕可疑嫌犯，無辜的蔣照生與一千人等便被帶回審訊。

在等候問審的時候，一名穿著筆挺軍裝的日本年輕軍官認出蔣照生，他難掩驚訝口氣地問：「蔣桑，您怎麼會在這裡？」餓了一天沒吃東西的蔣抬頭一看，只覺眼前的人長得面熟，一時之間想不起對方的姓名。

年輕軍官脫下軍帽、放在胸前，恭敬地說：「我是川上弘彥，前陣子到府上拜訪過，還託您拍攝了一組照片，寄給我在日本的家人。」

照生這才想起眼前的男子先前曾獨自來到照相館，當時他著便服，神情黯然憔悴。他出於關心與對方攀談，才知道原來在他駐守上海的這段日子，敬重的父親因病過世。家書寄到上海已是下葬後數把個月，他無法回鄉奔喪，送父親最

後一程。難掩悲傷的他，因而想拍一組近照，寄給遠方的親人，聊慰無法親侍病榻的遺憾。

川上那時看見在店裡玩的蔣音姐妹，兩人都穿著連身的粉紅小洋裝，模樣可愛，讓他想起小時候常纏在他身邊的妹妹，不禁微笑起來，也寬心許多。蔣照生見狀，便善意向他邀約，有空可以多來店裡走走，在異鄉有個可以談心的去處，稍解思鄉之情。

沒想到兩人再次見面竟是如此局面，川上問了原委，連忙對蔣照生說，「別急，我這就去替您解釋。」他逕自離開審問室，房門打開時，蔣照生看見門外擠滿枯等整天的民眾，焦急的面孔在聽見此起彼落的拷打聲時，條地扭曲變形，彷彿打在己身。

幸好，過了漫長的十幾分鐘，川上再度回到房裡，宣布蔣照生可以走了，並保證這次誤捕不會對照相館生意有所影響，他大可放心繼續開業。

蔣照生握著川上的手，直向他道謝，心裡卻有股說不出的複雜感受。日人在發動淞滬戰爭前，已多次在上海滋事，造成無辜傷亡，商紳井民談到日本人無不咬牙切齒。但眼前這位年輕人，雖是太陽旗底下的子民，卻也是無奈離鄉且失怙的孩子。他想著，戰爭實在可怕，我的四個孩子，以後也會遭遇不得不遠離家鄉、為了祖國奮戰的命運嗎？

當時的他還不知道，自己唯一的兒子在多年之後，將踏上一場旅途，從此無法再返鄉。

柏林 1938

最近大人們都怪怪的。蘿特從學校飛奔回家，就快放暑假了，照理說這個時候家裡已經開始討論夏季旅行，去年全家去探望住在圖林根（Thüringen）的舅舅一家人，最疼愛她的舅媽每天都替她綁可愛的辮子，還替她買了一件和表妹愛蓮娜同樣格子圖案的泳裝，兩個八、九歲的女孩幾乎整個夏天都形影不離。

今年五、六月起，天氣漸漸轉熱，蘿特引頸期盼爸媽會在餐桌上討論一年一度的旅行。她想，可能會去拜訪住在維也納的大衛叔叔嗎？還是住在波蘭的外公外婆？不管哪裡都好，她想念老是愛鬧她、又常帶她一起探險的表兄弟們，也掛念許久沒見面，每次捎信來最後一句都是「索尼亞（Sonia）、蘿特寶貝，我們很想妳們」的外公外婆。

但今年等了又等，每次她問起暑假要去哪裡旅行，總接著一陣不尋常的沈默，爸媽彼此交換眼神，然後話題就被帶開。

今天一定要問個清楚，她心想。

她推開房門，看見大她兩歲的姊姊正坐在書桌前若有所思。「索尼亞，妳在幹麻？天氣好熱，要不要去買冰吃？」索尼亞回過頭來，臉上神情有些複雜，好像想對妹妹說什麼，但想想又算了。她勉強擠出微笑，「好啊，去巷口那家吧。妳要吃什麼口味的？這次我出錢！」